

每次去看妈妈，都要到“凯司令”买奶油蛋糕。她喜欢奶油蛋糕，九十岁了，身体不好，躺在床上，把蛋糕递给她，她看看，说：“是凯司令的。”她记性不好了，眼睛不好，记不住刚才的事情了，记得住很久以前的事。但是，她记得住刚才的蛋糕是奶油蛋糕，而且是“凯司令”的。

她记得住以前的很多事情，也记得住年三十。所以，我每一次去，她都要问：“今天是年三十吗？”我说：“今天不是年三十，年三十还早呢！”

甚至在很热的夏天，也会问：“今天是年三十吗？”

我告诉她，今天不是年三十。

她过一会儿又继续问，今天是年三十吗？

我外婆说了老的时候，也总是要说年三十。年三十热闹，要准备很多菜，一家人在一起，围着桌子吃饭。人老了，是那么喜欢热闹，喜欢一家人在一起，人老了，寂寞得只想过年了，只有家了，而年轻的时候，只有外面，只有工作，我也是越来越读懂那棵《爱心树》，每一次那个孩子到大树面前来，大树都开心得浑身发抖，枝条不

停地摇摆，树叶窸窣窸窣。

我一遍一遍告诉她今天不是年三十，一遍一遍和她聊着从前的事情。她一遍一遍问今天是不是年三十，一遍一遍说她的童年，我的童年，她的家乡，她的长辈亲戚，她家边上长江里的鱼和虾，她说，她的眼睛这么好，大概是小时候总是吃鱼吃虾，我就说，肯定是这个原因！但是说着说着，她又哭起来，喊着爸爸、妈妈，她想外公外婆了。

我记不得外公了，但一年到头都会想外婆，结果我的眼睛也湿透，可是我的外公和外婆，是不会知道这想念的，他们也不会知道，自己的女儿现在躺在床上，飘扬的年纪，却还像个小孩，哭着说：“我想爸爸，想妈妈……”

我的确知道，我的外公外婆对我的妈妈实在太好了。所以在她没有躺在床上之前的很多年里，春天，总是要坐火车回到长江边上那个开满了油菜花的家乡，去看爸爸妈妈，点上几根香，放上鱼和虾，放上糖果，说：“爹爹，妈，你们吃

去看妈妈

梅子涵

哦！”那么多年的春天，外公外婆都不冷清，都真正地在油菜花的盛开间，在女儿轻轻缓缓的喊声里，还有我和妹妹弟弟的轮流陪同。

生命是那么无可奈何地分别，可是现在我可以坐在妈妈的身边。虽然我总是忙啊忙啊，妈妈也希望我可以有能力忙，但是毕竟还是带着“凯司令”奶油蛋糕去看她，喂着她吃，她说：“吃不下了！”

我说：“吃！”她说：“大儿子不讲道理。”我说：“吃。”她笑起来。

因为她以前对吃不下的外婆也是不讲道理的。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想起了自己的不讲道理。

她又问我：“今天不是年三十了吧？你弟弟怎么还不烧饭呢？鸡买了没有？”

我告诉她今天不是年三十。

在她的面前，所有的人都特别有耐心了，因为



不愿意做，而是不会做！

原来，从小开始，他妈妈就对他实行“快乐教育”，她认为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高兴就学，不高兴就不学，实际上是放任自流。小伙子小学的时候因

孩子的学业成绩终于有了起色。

她也希望我把这件事写出来，让其他家长引以为戒。

“快乐教育”这个理念最早由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也应该是快乐的。”在他的培养下，他的侄子小斯宾塞14岁就被剑桥大学录取，是精英中的精英。可惜他的“快乐教育”理念被很多家

长误解，以为让孩子高兴才是快乐教育，由着孩子的性子来，以至于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错失了很多督促孩子读书、更正孩子错误的机会，待大错铸成，悔之晚矣。

这世间，哪怕是一丁点的成就，都不可能只有快乐，没有痛苦，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必须要让孩子尝到“苦”的滋味，才能得到“甜”，也才会珍惜“甜”。

不吃苦哪有甜

王文献

为聪明也因为功课简单，基本能应付，还考上了不错的中学，但到了中学没有下苦功夫认真读书，渐渐就应付不来了，最后连功课都不会做。

朋友自己是通过苦读才考上大学，走出小山村，走出国门的，总想给孩子最好的，怕他和自己一样吃苦。然而，读书哪有不苦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一定非要做人上人，但不吃点苦，恐怕孩子连中学都无法毕业。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朋友不再对儿子放任不管，而是监督他回过头去，从中一的课程慢慢补起，



征文启事

这是一场疫情防控的硬仗，你我皆身处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除夕夜告别亲人，剪短头发，驰援武汉；自我隔离，从休假中返岗；在地铁收车后还要做好消毒；买咖啡时主动与他人保持距离；为老人送饭送药；边工作边带娃；利用宅家时间看书、反思；每天问候远方亲人；开始练习书法、瑜伽，钻研菜谱为家人调剂营养；为了保障市民生活仍在天天上班……生活在战“疫”中继续，向前！我们并肩奋斗，守望相助，鼓劲加油，自律自重。

说说你的战“疫”生活故事，我们将择优在夜光杯版面、微信公众号和新民APP夜光杯频道等刊发。文章1200字以内，请留下电话以便联络。投稿邮箱：hongse@xmw.com.cn



我们不但记得很久以前的事，还记得刚才的事，尤其比任何时候都格外知道：她是我们的母亲，把我们养大。那么多年，很不容易！母亲都是不容易的。

我问她：“妈妈，你还记得，那一年，你偷偷地到我的农场去吗？”

那一年，我在上海休假，她却偷偷地跑到海边农场去看我住的宿舍，我睡床的，捏得我睡的被子，回来后偷偷告诉外婆：“小孩子的被子太薄，冷的。”

就非要我带一条厚些的被子去，我不肯带，她说，不带会冷的！我说我不冷！她没有办法，就买了一件灰色的风雪大衣给我，我嫌太高级了，带到农场也不好意思穿，就当被子盖在上面，非常暖和。其实本来被子是薄的，冷的，可是我喜欢硬撑，我那时多年轻！

我问妈妈，那一年，她给我钱，让我去买一只东风牌手表，125元，还记得吗？

我是到川沙镇上去买的，市区买不到。乘六分钱的轮渡到浦东，又乘两毛钱的小火车，趴在火车的窗口，心情快乐得飞在天空。后来，我戴着手表回农场，总是露出来，在那个艰苦的岁月，看着它的指针，愉快地度过，不慌不忙，因为手表很准！

我告诉妈妈，十岁那年，困难时期，吃不饱，中午在院子里的食堂吃饭，一个月的饭票，半个月就

吃完了。撒谎说，丢了，妈妈牵着我的手在大院的路面上找啊找，找不到，第二天醒来，妹妹把一叠饭票递给我，说：“给你，哥哥，妈妈捡到！”五岁的妹妹不懂，妈妈也撒了谎，因为我的饭票没有丢，是吃光了，那是妈妈从哪儿“捡来”的呢？她竟然没有骂我一句！

二十一岁那年的年三十，我去海宁路的大浴室洗澡，妈妈递给我三十块钱，说：“你去买一件衣服，再买一盆花，过年了。”

我在南京路买了一件蓝色棉衣，式样端庄、特别，那是我第一次自己买衣服，妈妈给的钱，那时，我在农场的工资是十八元。

妈妈听着我说这些，点着头，好像全记得，可是又问：“今天是年三十吗？你要在这里吃饭！”

我只好说，今天是年三十，可是今天没有买鸡，没有买鸡怎么过年啊，等买了鸡我再吃年夜饭，而且我要买一个很大的“凯司令”奶油蛋糕来。

妈妈说：“不要忘记给外公外婆烧香。”

我说：“知道了！”

我又看一眼墙上妈妈的那一张年轻照片，穿着泡泡纱的连衣裙，长辫子，四五岁的时候，我竟会每天下午独自走到她上班的工厂，站在对面的文具店门口，下班的妈妈从厂里的研究室走出来，穿过马路，8路有轨电车当当地开过去，她走到我面前，牵起我的手，回家。那时，她那么年轻，我那么幼小。

篱笆在诗歌里，总是美的。自从陶渊明先生的目光，从东篱之上，望了一眼不远不近的南山，篱笆的文化价值便确立了下来。“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荒苔野蔓上篱笆，客至多疑不在家”等等。这诗句中的篱笆，已经不只是一道风景，而是隐者神秘的符号。

小时候在北方，我们把篱笆叫障子，我疑心这是外来语。胡同里家家户户都有障子，我们家的障子是木板钉的，似乎从我记事就在，一直到离开。障子没有油漆，颜色却近于黑色，常年风吹日晒的缘故。一米多高，对于小孩子，却仿佛柏林墙。因为捉蜻蜓，或是摘向日葵，木刺扎了手，甚至衣服袖刚坏，也是常有的事。

清人林佶的《全辽备考》中，对当时的东北边陲宁古塔的民居风俗如此描述：“西南窗皆如炕大，糊高丽纸，寒闭暑开，两厢为碾房、为仓房、为楼房，四面立木若城，名曰障子，而以栅为门，或编桦枝，或以横木，庐舍规模无贵贱皆然，惟有力量大而整耳。”这是从乡贤金毓黻静庵先生编纂的《辽海丛书》中查考而得，可见障子一词，历史悠久。

在一般人看来荒凉偏远的地方，一道结实稠密的障子，固然可以挡风沙，防御兽害禽畜，也是家园安全的保证，毕竟，院子是主人的城池。

喜欢植物的人看书，总是会留心书里面出现的植物，即便是偶然的一两句，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新小说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的《橡皮》译介到中国，书中描述那位警察潜入案件现场时，有一句描述：“一道铁栅再加上修剪得和人一样高的卫矛篱笆，使这座房子与外界隔绝。”我相信，一般读者不会大注意这一句，马原与孙甘露他们也不会。作家后面又几次提到“修剪整齐的卫矛篱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卫矛”，后来翻了挺多材料，弄明白这是一种灌木，耐修剪，常用来做篱笆，只不过中国北方比较少见罢了。

这样的障子，听上去不错的样子。我后来自己有了一个小院，虽无金山银山，但出于私密的考虑，便决定植一排树篱。到花木市场去看，除了法国冬青，没有其他选择。店家说，法国冬青，就是日本珊瑚树，也叫卫矛，种上浇透水，长得快。

我还是有点常识，冬青绝非卫矛，上海人倒是叫它珊瑚，至于为什么冠以法国、日本，不清楚，一笔糊涂账。我买了两棵冬青，请人帮忙种了，最初，稀稀拉拉的，几番修剪后，渐成一道绿墙，到最后，隔着墙，人影都看不见。

冬青的生长，春秋两季最快，如果不管它，会蹿到十来米，这样的篱笆，毫无美感可言。于是，每年春天，修剪是一件逃不掉的事情，梯子高架，电动手动并用，园丁展示着理发师一般的娴熟手艺。

欧式花园，侧柏也是可以绿篱的，感觉更加敦厚严实，但在中国人的习俗中，这种植物过于严肃了，故所种者寡。

我见过更好看的篱笆。有一年夏天，在浙东的农家，以槿为篱，围着的小院，远处山色与粉红的木槿花相映衬。院子里的一方菜畦，种着时鲜的蔬菜，喝着自家的茶，此乐何极。后来读文震亨《长物志》，见“木槿”条：“编篱野岸，不妨间植，必称林园佳友，未之敢许也。”原来槿篱又是古已有之。“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不过文氏说木槿“花中最贱”，语虽恶毒，却也道出其本色，民间一向称其篱障花。

这样看来，早年的障子太原始了。不过，倒也是那样年代中国人生活的现实与民居折射的时代风习。

沧海桑田，我家的老房子，早就变为一个中学的操场，城市里，几乎见不到障子的踪迹。北方的乡村里，障子一定还有，爬满藤蔓，牵牛带着露水，为采风的画家与摄影师提供绝妙素材。篱笆的历史与美学，是值得研究的，万物简史中理应有那么一册，它是我们往昔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无数温馨记忆的物质文化遗产。

篱笆传

李涛



松鹤图 (中国画) 万伯翱

要过年了，老合肥人以前过年，家家都要炸圆子，象征团团圆圆。我不知道胖乎乎的圆子和这座城市的名字是一种偶然遇合还是一种必然呼应。我家不是土生土长的合肥人，但已经“合肥化”了，也很喜欢做各种圆子：猪肉丸子、糯米丸子、豆腐圆子、山芋圆子、绿豆圆子、藕圆子。老合肥人还会做挂面圆子，我们家倒是一直没有学会，大概与我们不太喜欢吃挂面圆子有关。小时候，母亲还做过藕圆子，记忆里将藕在竹篮里刨成薄片，加上葱姜蒜末，再用豆粉捏拢、油炸，味道好极了。老母亲久不操作，已经多年没有吃过藕圆子了。

我的上海朋友，多有一个会做菜的姐夫或兄弟，合肥不同，观念陈旧，男孩子少有不厨的。我家上一辈是母亲掌勺，母亲渐老，“退居二线甚至下岗”，现在过年则由二姐担任主厨。二姐在外地工作，年前她一回来，我们家的年也就

到了：厨房顿起炊烟，香味四起。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写道：“合肥丸子是合肥的家常菜，只有合肥来的老女仆做得好，做法也不难。先煮熟一锅糯米饭，再把调好的肉糜放进去捏拢好，大小和汤圆差不多，然后把糯米饭团放进蛋汁里滚一滚，投入油锅里煎熟，姐姐是那样喜欢吃，又吃得这样高兴，以至于引得全家的人，包括父亲和佣人们后来也都爱上了这道菜。”合肥人一看就明白，所谓的“合肥丸子”就是糯米圆子。“放蛋汁里滚一滚”，是有钱人家的做法，记得小时候，母亲都是用豆粉滚一滚。合肥人过年，可以不吃饺子、不吃汤圆，一定要吃糯米丸子。二姐的手艺最好，她炸的糯米圆子远近闻名，分送左邻右舍，人人夸赞。二姐说，除了姜末、大蒜要切

碎放足，糯米和大蒜是绝配，一经油炸即刻放香，趁热吃最适用。任凭窗外漫天大雪，室内仍旧一团和气，春节的欢喜与温馨大抵如此吧！实际上，从小到大，一炸圆子，我必定守在锅边，炸好就往嘴里丢，“年饱年饱”，就是这样饱的。隔天回锅的圆子，就大为逊色了。

现在年味，一年淡似一年，因为当下的淡，记忆中的年也就越发浓了，尤其是关于吃的记忆，怎么都挥不去——也回不去。有时候反而在文学作品里可以回味一下老滋味。张爱玲是“李合肥”的后代，家里的女佣都是合肥人，她的小说里潜伏了一条相对于大上海的“乡下”暗线。她在《小团圆》里提到几样合肥菜式和点心：空心炸肉圆子、火腿萝卜丝酥饼、枣糕、紫晕(芸)豆酥糖、大麻

饼等。合肥大麻饼，现在过年也吃，但紫晕(芸)豆酥糖，倒是“古色古香”，我这一代合肥人听着如前朝遗事。

合肥人爱吃油炸食物。小时候，我们住在工厂区宿舍，一个长走廊连着六户人家，过年时，家家油烟，户户飘香，打成一片。还相互交换各自的拿手菜，隔锅饭香，一点不假，总觉得邻家的食物格外好吃。现在都说油炸的食物不健康，但在母亲的心目中，如果没有一锅翻滚的油，飘着香味，那就不叫过年。朋友里也有“年夜饭”去餐馆吃的，渐渐地似乎成了风尚。保守的母亲听了不以为然，放了狠话：“老太太活一天，就别想在餐馆吃年夜饭。再苦再累，年菜必须家里做，年夜饭必须家里吃。”

十日谈

生活在大城市，心里一直牵挂着手工年糕的滋味。 年俗味儿 责编：杨晓晖